

# 急須擴展公帑資助大學本科生學額



何順文

2013年特首《施政報告》有關香港高等教育的篇幅只有大約三行字，反映政府繼續漠視有關範疇和問題，再次令人感到失望。

香港學士教育的普及落後於環球發展趨勢。最近，一項國際性調查指出只有26%的香港勞動人口有大專學歷（不到兩成擁有至少學士學位），顯示香港嚴重落後於大多先進經濟體（如芬蘭37.3%、南韓35%）。

## 副學士資歷變「半桶水」

這個偏低教育程度未能應付一個知識型社會的人力需要。社會不斷變化，學歷愈低，就業或流動的機會就愈低，人們不斷要自我增值。雖然大學入學率與經濟增長並非線性關係，但如香港要提升國際競爭力、社會公平和流動、文化的傳承與創新，必須盡快檢討和改革大學入學和資助的政策。

過去十五年，政府名義上把大專教育入學率由1990年的18%增加至2011年的40%，但大學本科新生的政府資助名額於1994年一直凍結在14500個（即適齡學生的18%入學率）。由於2012年引入三三四

新學制，這個名額略增至15000個，但仍遠遠不能滿足本地高中畢業生的需求。過去十年，在大專教育的增長主要在自資副學士課程上；對香港作為一個先進經濟體，這是一個典型的社會不公，也是一個國際的恥辱。

2012年，超過74000名中六學生參與中學文憑考試（DSE），約有26000名達到入讀學士學位的最低成績要求，但只有約12000名可以通過聯招進入大學資助委員會（UGC）資助的學士學位課程（另外約三千個名額給予非聯招申請人）。換句話說，每年約14000名聯招及格考生遭八大UGC資助院校拒諸門外。這個激烈的競爭和資助學額的嚴重短缺，每年造成師生家長的高度精神壓力、失望和沮喪。

每年約60000名未能進入UGC資助課程的高中畢業生，少數選擇到海外升學或報讀海外院校在港開設而質素極為參差的離岸課程，而大多數只可選擇進入本地自資副學士課程（約12000個名額）或學士學位課程（約4500個名額）。

此外，現時一窩蜂的副學士課程設計只是為畢業生繼續升讀學士，而非為未有

能力或有興趣念傳統大學的年輕人而設的高水平職技培訓。因此香港現時同時欠缺高水平職技學院和學士學額，成為「兩頭唔到岸」。只有少於15%的副學士畢業生最終可以獲得取錄，繼續升讀本地銜接（top-up）學士學位課程（而只有約4500名為政府資助），令大多這些副學士畢業生的資歷變成「半桶水」，市場價值受到質疑。因此，我們一方面要改革部分副學士課程，加強職訓的內容，以能培訓稱職的中層技術人才，也要大幅增加學士學額。

近年為了增加名義大專入學率及推動本地「教育產業」，政府承諾提供低價土地及發展貸款予私立大專辦學團體，以能短期內大幅增加自資學額。

## 不贊成「大學學位量化寬鬆」

根據政府估計，至2015年，約三分一的適齡學生可接受學士學位課程；連同副學士名額，約三分二的適齡學生可接受大專教育，但這些額外的學額大部分為自資而非由額外的公帑資助。因此，很多持續多年的問題仍未能解決。

這個18%適齡學生接受資助學士教育的政策（相對世界平均的30%），顯然與發

展經濟社會和確保公平教育機會的環球趨勢不相稱。筆者對特區政府（包括現屆政府不把教育放在重要政策議程之內）長期忽略公帑資助學士學額嚴重不足的問題，感到失望。長遠來說，這個長期停滯的形態不單不利提升香港人的質素，亦會侵蝕香港的可持續競爭力、社會公平性、流動性、文化水平。

大學教育普及化是全世界的趨勢，已不是昔日的少數精英專利品。根據OECD數據，各國政府平均資助學士入學率為七成。新加坡把政府資助學額由目前的27%提升至2020年的40%；中國也決定從現在的20%到2020年增加至40%。當然大學入學率不等同生產力將按比例增加，還要看大學教育與大學生的質素。但這個高的資助學額比例就是要確保高等教育

的獨立與質素不受經濟或市場因素太大影響，透過提供更公平接受高教的機會來保護低收入家庭。

大學教育的目的不是單為增加個人收入或GDP，增加大學學額與GDP也不會有簡單的線性關係，但更多人接受高等教育，卻可減少他們向下流動的風險，實質提高個人的能力質素，也可提升社會公平與和諧。

我們如果視大學教育是一個具備能力資格的年輕人的基本學習權利和思考學問人生的機會，以及一個社會傳承知識文化的基本義務，那麼香港的大學入學率仍遠遠不足，更談不上有所謂「過度發展」、「大學生過剩」等憂慮。我們絕不贊成「大學學位量化寬鬆」，在大幅增加公帑資助學額之餘，未來更應重視如何保障大學教育和畢業生的質素。  
作者為資深大學教授及主管



■一項國際性調查指出，只有百分之二十六的香港勞動人口有大專學歷，顯示香港嚴重落後於大多先進經濟體。  
(資料圖片)